

《東華漢學》第 17 期；139-17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6 月

問塗・經歷・回還 ——周濟「四家學詞門徑」的理論建構*

余筠珺**

【摘要】

周濟提出「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等四家學詞門徑，而今學者間已論及四家之所以「立」及其位階遞進，或緣於詞派立場、或考量初學之便、甚至觸及四家身世。本文於此些前行研究基礎上，擬由周濟詞論尋繹「門徑」發展的內在理絡，先源其「詞史」、「家數」而延伸述及「門徑」之屬，並且闡釋「門徑」意義及周濟對南北宋門徑的認知。最後，以「思筆離合」、「寄託出入說」等標準，說明四家由南返北、排序遞進的細微差異。

關鍵詞：周濟、學詞門徑、詞史、詞統、寄託出入

* 本論文的想法是在劉少雄先生課堂中逐步形成，之後在撰寫過程中，賴信宏同學、張宇衛學長曾提供諸多重要的意見，同時，渥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許多寶貴意見，於觀念上深有啟迪，特此誌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周濟（1781-1839）是清代常州詞派重要的奠基者，詞學相關著作主要有前後期的兩本詞選，前期所選《詞辨》原有十卷，今僅存正、變兩卷，同書附有詞學評論，後人輯為《介存齋論詞雜著》共三十一則。《詞辨》擇別良窳，詮次十卷，各卷次第，皆有用心，指導後學的意味濃厚；如由正、變來看，前期已經開始透過時代先後的分類，重新規模五代兩宋詞史的架構。¹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五十歲左右才完成《宋四家詞選》，²建構出自身完整的詞論體系，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詞為首，四家之後分別載錄其他詞家之作，以作家風格作為類型判分的標準，部分選詞附有評點，書前的〈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是周濟詞論的核心觀點。較諸《詞辨》的選詞標準，《宋四家詞選》的理論系統更為縝密，不只將《詞辨》、《介存齋論詞雜著》時期的「詞史」、「寄託說」發展為「寄託出入說」，同時指出「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四家學詞門徑」以及「渾化」的論詞標準。其中，本文旨在探究「四家學詞門徑」在周濟詞論中如何生成乃至成為最終的體系架構，並於此背景之下，談論「四家門徑」貫串的建構理路。

¹ 清·周濟於嘉慶十七年（1812）作成《詞辨》十卷，因遺佚僅存前兩卷，並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潘曾瑋刊刻。《詞辨》自敘創作動機：「向次《詞辨》十卷，一卷起飛卿為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為變。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為三四卷。平妥清通纔及格調者為五六卷。大體紕繆、精彩間出為七八卷。本事詞話為九卷。庸選惡札，迷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為十卷。」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636。

² 《宋四家詞選》之序作於道光十二年（1832），共編選51位詞人，選錄詞作239首，分成四家派。詳見鄭利安箋注，《宋四家詞選箋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歷來對周濟「四家門徑」的探究，往往由歷史價值取向來肯定「四家門徑」理論的創獲，用以推尊其對常派的貢獻。³近來已有學者由不同層面省思周濟「四家門徑」之學詞用心，劉少雄〈「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的歷史形貌〉認為「四家門徑」是周濟為了破浙派尊南宋姜、張之清空，而以南宋吳、王之質實取代姜、張，並返回北宋之渾涵；又以文體疏密判分四家為正聲蘊藉、變體清疏二體，且謂姜源出於辛。⁴劉說由各詞派的「詞統」譜系名單，談四家之所以立的原由以及地位升降的可能原因，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延伸討論四家之間的關係。楊柏嶺〈渾化理念的門徑追尋——周濟的宋四家門徑論〉認為「四家門徑」是周濟為了實踐「寄託出入說」的觀點而提出的，四家能「領袖一代」是因為取徑易見，因此確立四家地位的判斷準則在於「學」的門徑步驟，並非指四家詞各臻至詞史頂峰，⁵楊氏試圖說明周濟為什麼選擇這四家，雖點出「詞統」與「學」的關連，然而「四家門徑」的前後關係，仍待進一步廓清。黃志浩《常州詞派研究》以範疇對舉的方式探討周濟的詞論，如空與實、有無寄託、出與入、換筆與換意等，並藉此討論「四家門徑」之間的互補關係，多有發明。此外，黃氏以多重的「知人論世」之法來推衍四家的特色，⁶論旨以周濟之「詞史」、「寄託」觀點為脈絡，以四家身世等更

³ 葉嘉瑩，〈常州詞派比寄託之說的新檢討〉，《清詞叢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45-172；吳宏一，〈常州派詞學研究〉，《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0），頁69-187。

⁴ 劉少雄，〈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頁52-57。

⁵ 楊柏嶺說：「周濟論詞原本就是以『無轍可循』為極詣，但作為論詞門徑，他認為最好還是選擇有轍可循者，故『退蘇進辛』。」揭示「四家門徑」基本訴求在於「有轍可循」，以此方便初學詞者。見《晚清民初詞學思想建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頁247。

⁶ 黃志浩先將周濟的詩詞、書畫理論以及時人的序跋都納入思考的一環，全面掌握周濟的身世抱負和理念，其次，以二重寄託連結宋四家和清代周濟的關係，發明清真於宣和之政治士風與清中葉若有彷彿、稼軒壯志難酬與周濟身世頗為近似、夢窗以江湖之感隱約其詞、碧山遺民生活多故國之思。是知黃說以「寄託」之法談周濟之「寄託說」，對各家的身世、詞作及詞論都作了各個層面的扣合。見《常州詞派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多旁證史料去印證周濟「四家門徑」的理路，因承認生命的相映感通而得以透過「知人論世」之法於詞中互為主體，以周濟的價值觀來推想周濟推重四家的可能原因，然而此對應關係並不屬於詞論中「四家門徑」的內在聯繫。

上述前行研究各自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周濟「四家門徑」，或基於詞派理論的建構、或考量便於學習的立場、甚至關注到四位詞家的身世背景，無非是希望能對周濟「四家門徑」有更具體的掌握，只是四家遞進的關係，仍有討論的空間。⁷因此下文將以「門徑」觀為論述主軸，主要討論方向有三：

- (一) 探討周濟對張惠言（1761-1802）《詞選》之承衍，如何由前期「詞史」、「家數」等屬於泛論的概念，到後期透過選本更具體的落實而完成「門徑」觀。
- (二) 分析「門徑」觀的意義，並闡釋周濟如何分別從南北宋詞的時代區分、南北宋詞的模擬影響到四大家數的類型等文學現象的觀察，逐步建構出「門徑」觀的理路。
- (三) 討論「思筆離合」、「寄託出入說」等判斷四家位階的標準，並分述周濟對四家之評價及其進程。

版社，2008），頁 226-251。

⁷ 關於「四家門徑」的遞進關係，碧山之入門、清真之渾化，出與入的起始兩端較能彰顯周濟詞論的宗旨與訴求，因此諸家說法並無太大差異，然而「歷夢窗、稼軒」兩者之前後關連、以及夢窗、稼軒分別與碧山、清真之間的聯繫，由於理論發展的中間過程存在更細微的轉換關係，因此夢窗、稼軒於中介階段的指標性為何，便會因切入角度而有歧異。本文嘗試從周濟整體的詞論體系，建構「門徑」發展的脈絡，期能就詞論自身尋繹「四家門徑」的內涵。

二、周濟對常派情志內涵的承衍

常州詞派的理論變遷，由早期張惠言在《詞選·序》的主張，經過董士錫（1782-1831）的傳播，⁸到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自道評價觀點的三次轉變，⁹內容已經不太相同。周濟〈存審軒詞自序〉說：

吾郡自臬文、子居兩先生開闢榛莽，以國風、離騷之旨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一時作者競出，晉卿集其成。余與晉卿議論或合或否，要其指歸，各有正鵠。¹⁰

這段話一來自述與張惠言、董晉卿等人的師承關係，二則提出他對張惠言理論的認知。所謂「以國風、離騷之旨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觸及到二個層面的問題，首先，張惠言透過風、騷之家國託喻的內涵，以此比附五代兩宋詞的創作意圖，從而建立一套詞體情志與表述的連結關係。其次，張惠言具體示範了讀者後設重詮的閱讀策略。¹¹可以說包括周濟在內，整個常州詞派一直在唐宋詞等經典文本中尋找新的閱讀視角，以此重估經典作家的地位。

相較於周濟的自我定位，常州後學對張、周意見的師承與呼應關係，則有鳥瞰式的觀照與比較，繆荃孫（1844-1919）〈常州詞錄序〉說：

雍、乾以降，詞學少衰。拾陽羨之餘瀋，儲、史同盟；緒梁溪之逸響，鄒、華競秀。當浙派橫流之時，而有振衣獨立之概，臬文晚出，

⁸ 參陳慷玲，《清代世變與常州詞派之發展》（臺北：國家出版社，2012），頁169-177。

⁹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云：「余少嗜此，中更三變，年逾五十，始識康莊。」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46。

¹⁰ 清·周濟，〈存審軒詞自序〉，《存審軒詞》，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十八年周恭壽刻求志堂存稿匯編本影印，1995），頁1。

¹¹ 張惠言重「鑄」經典詞作，發展出新的閱讀詮釋策略，即如侯雅文〈常州詞派的構成〉指出張惠言從政教情志的角度去界定「詞本體」的意義，於是作者的創作意圖、表現手法以及讀者詮釋皆同時指向政治諷喻的比興寄託。見《中國文學流派學初論——以常州詞派為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頁208-219。

探源李唐，止庵和之，遂臻正軌。極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附景物，張皇幽渺，約千篇為一簡，覺萬里於徑寸。上之則〈小雅〉之怨誹、〈離騷〉之俶詭；次之亦觸類條暢，感物流連，予懷信芳，結想斯遠。真樂府之揭櫫，詞林之津逮也。¹²

清代前期詞派多以某種風格類型為指標，陽羨詞派強調「豪放」詞風、浙西詞派追求南宋姜、張詞「醇雅」的美感價值，張惠言繼承浙西風潮之後，將眼光從南宋上溯到唐代詞家，周濟則是同聲呼應張氏的說法，立下詞學的指歸。相較之下，隨後的常州詞派不再側重某一風格性的書寫課題，而是將焦點放在對詞體的重新定義，尤其以張惠言〈詞選序〉的內容為代表。此外，蔣兆蘭（1855-1938？）《詞說》也說：

嘉慶初，茗柯、宛鄰，溯流窮源，躋之風雅，獨闢門徑，而詞學以尊。周止庵窮正變，分家數，為學人導先路，而詞學始有統系、有歸宿。¹³

這段文字精要地點出張、周的成就，注意到張惠言將詞學上溯詩、騷，「獨闢門徑」¹⁴引起「尊體」的效果；周濟則繼承張惠言的「正變」觀¹⁵並以「家數」¹⁶作為其理論的起始，因而另立常派的「詞統」與學習典式。可見張、周二入實為常州詞派中心意見的代表人物，因此下文將從

¹² 清·繆荃孫編選，王鈔鈔、孫廣華整理，《國朝常州詞錄》（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

¹³ 清·蔣兆蘭，《詞說》「清季詞人」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4637。

¹⁴ 此處「門徑」是指張惠言、張琦（1764-1833）兄弟提出新的理論方法，即蔣兆蘭所謂「溯流窮源，躋之風雅」，和本文論周濟「門徑」所指不同，周濟「門徑」之意在於「為學人導先路」。

¹⁵ 詞學的正變觀，自北宋以來皆以婉約、豪放的本色論作為核心。至於張惠言的正變觀，則是回到詩學傳統的正變觀，以時代先後來論詞體的正宗與變格，張惠言追溯到晚唐五代作家，探源別流以論盛衰，具有崇尚古雅的傾向。參黃雅莉，〈正變觀的發展〉，《宋代詞學批評專題探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頁384-427。此外，周濟〈詞辨自序〉說：「一卷起飛卿為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為變。」《詞辨》之「正變」觀顯然是受到張惠言風雅比興的影響。

¹⁶ 周濟前期已有「家數」區分的論述，更於《宋四家詞選》論列四大「家數」，建立「詞統」。

情志內涵、閱讀詮釋兩個角度討論張惠言詞論的核心精神，有此基礎才可以說明周濟前有所承的部分，以及他如何建立自身詞學理念的規模。

(一) 張惠言「意內言外」的詮釋範式：「詩騷」情志與「言意」關係

張惠言《詞選·序》清楚地說明其詞論所具有的創發價值，〈序〉云：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跌盪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曼辭而已。¹⁷

張惠言針對詞體作出本質性的說明，提出「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詞的本質根源於人的情性，進而表現為「意內而言外」之幽微的話語。那麼，情性具有如何的內涵？又「言意」關係如何透過「微言」表述，以興發感動？從中可以發掘張惠言詞論的兩個核心觀點，其一，提升情志在詞體中的價值，即是尊體。張惠言認為詞體中情感的根源與《詩經》的比興、騷人之歌相通，強調政教情志的家國關懷，因此，情感的本質是崇高的，雖然他也承認「其文小」、「雜以昌狂俳優」等一般世俗性的看法，但張惠言在這樣導正的力道中，以寄託之意重新推尊詞體所蘊蓄的力量。¹⁸其二，提出「意內言外」的讀法，從而建立情志與表述模式的連結。「意內言外」透過言、意的間隙傳遞個人情性難以完全抒發的表述，再經由人與人之間同情共感的能力，超越話語而得以掌握個人的中心意旨與情感，即如「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¹⁷ 清·張惠言，《詞選·序》，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17。

¹⁸ 清·張惠言，《詞選·序》說：「無使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旨在推尊詞體，與詩賦列於同流。頁1617-1618。

幽微的言語表述來自於「不能自言之情」的情感特殊性，因此表述模式便呈現「低徊要眇」的隱喻效果。至於「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的作品都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以喻其致」則指情性與表述搭配得宜。

可以說，這種「意內言外」的讀法針對既存的前代作品，重新提出詞體中創作者情性的根源，進而由言意關係的表述模式建立詞體創作的中心精神。如果說張惠言真正具有啟發常州詞派後繼者的力量，便在於此。只是，張惠言將作品情志的指涉內涵推及到政教關懷，一方面推尊詞體，相對地也禁錮了文學自由創作的可能性以及閱讀詮釋的空間，換言之，如同王國維（1877-1927）之批評皋文「深文羅織」，¹⁹張惠言的詮釋困境就在於過度附會政治局勢。經由上述可知，常州詞派所提倡的新的閱讀詮釋方法之所以成為可能，乃是因為重新規定並強調作品中情志的核心位置，其次才會有表述方式與閱讀詮釋的問題，因此情志內涵始終是常州詞派共同關懷的核心。

（二）周濟「詞史」觀：推行詞體對家國意識的關懷

周濟「學詞三變」其中一個轉折關鍵在於認同常州詞派的理論背景，潘曾瑋指出張惠言《詞選》「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懲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於風雅之歸。」²⁰周濟透過傳承具有政教功能的「風雅之歸」，作為補救時弊的創作方針，並進一步提出「詞史」觀。²¹《介存齋論詞雜著》「詞亦有史」條云：

¹⁹ 王國維指出：「固哉！皋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見王國維著，滕咸惠校注，《人間詞話新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85-86。

²⁰ 清·潘曾瑋，〈刊《詞辨》序〉，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8。

²¹ 針對「風雅之歸」與「詞史」觀，除了由張、周詞論內容的承衍來討論，學者也從兩人的學術、政治背景進行比較，如徐楓提到：「周濟和張惠言一樣，皆重義理，尊詞體，但張惠言是立足於詩詞同源而上攀風騷，周濟則更多地根植於事實。」又說：「他一生的遭際和乾嘉之際『泰窮將否』的社會現實『境地』，使他的見事、識理都比張惠言多而且透。」且「有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沉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²²

文學創作所寄託的感慨，是人對盛衰時代所起的各種反思與情感牽動，作者隨時代脈動而培養出關切時事的懷抱和敏銳度，依照各人的性情、學問、境地，往往有相異的觀察點和體會，或能洞燭先機、防範未然；或能針砭社會的疲態、先天下憂，無論採取積極、消極的應世姿態，都出於由衷的肺腑之言。「尊體」首先必須從詞人自身的觀念和行為上破除迷思，實際地壯大自我的格局和眼界，詞體自然會因人而尊，懷抱不同，格調自高。當作品成為足以論世的憑藉，詞體也就樹立了其獨特的「詞史」地位。

如果「詩史」有其直陳其事的針砭作用，那麼詞體自然也要善用自身「興於微言」的特性來表現「詞史」的內涵。²³換言之，張惠言不過援用了詩學比興的論述模式來推尊詞體；周濟則承繼了這樣的精神，卻直接就詞體本身的美感特質與發展歷史來談，²⁴以「詞史」、「寄託」

著與張惠言經學家眼光不同的史學家膽識，他不是以『治經的方法去治詞的』，而是充滿著一個史家獨有的對社會危機的敏感和憂患意識來論詞之社會功能。」從三個角度來區別張惠言、周濟的異同，見《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頁298。另外，陳懋玲，〈嘉、道時期周濟詞史說的現實意義〉區分張、周二，除了經、史的學術專長導致詮釋系統的差異之外，政治局勢的背景也影響了論詞態度，大抵張氏於乾嘉時期文網森嚴，周濟於嘉道之時，中國已是內憂外患的處境，是以張氏拈出微言大義，周氏則直接批判時局。見《清代世變與常州詞派之發展》，頁178-180。

²²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0。

²³ 遲寶東說：「張惠言所主張的情感是由外部指向詞人自身」、「周濟所主張的情感是由詞人自身指向外部。」指出張惠言是從外在環境如儒家思想對詞人情感表現的要求來立論，周濟則是由詞人因外在環境所引起的感受著眼。見《常州詞派與晚清詞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頁62。

²⁴ 黃志浩說：「必須堅持詞學的本色特徵，注意運用詞學特有的表現方法來

等概念完成尊體說的理論架構，已經擺落「風騷意旨」的反覆套用，從詩學的脈絡走出詞學自身的尊體路數。

「詞史」觀貫串周濟整個詞論體系，到《宋四家詞選》仍以此作為判別詞家地位高下的基本標準。早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的論詞立場多由「詞史」出發，期許創作者要能反映其身處的時代而有所「寄託」。例如，論吳文英：「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閑散，使人不易測其中之所有。」²⁵論王沂孫則云：「中仙最多故國之感」，²⁶論唐珣則說：「玉潛非詞人也，其〈水龍吟〉『詠白蓮』一首，中仙無以遠過。信乎忠義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自工。特錄之，以終第一卷。後之覽者，可以得吾意矣。」²⁷至於後期「四家門徑」的觀點也抱持相同的態度，例如，《宋四家詞選》評周邦彥〈解語花〉：「此美成在荊南作，當與〈齊天樂〉同時，到處歌舞太平，京師尤為絕勝。」²⁸辛棄疾〈漢宮春〉：「換頭又提動黨禍，結用『雁』，與燕激射，卻捎帶五國城舊恨。辛詞之怨，未有甚于此者。」²⁹王沂孫〈掃花游〉：「刺朋黨日繁。」³⁰透過實際的評點詮解詞作中寓託的政治現實，然而四家之中唯吳文英有詞無評，或許是認為其詞「不易測其中之所有」的緣故。

「詞史」的精神繼承張惠言家國政教的關懷，此後常州詞派選詞或評詞都從這個預設角度切入。只是周濟除了看重這類普遍性課題，還區分「四家門徑」以抉發作家獨蘊的才性及詞風，賦予情志內涵更豐富的理論層次。

反映，而不是像詩歌那樣直接歌詠其情其事。」張惠言對詞體的思考，是取詩歌來做參照組，周濟則就詞的文體特質進行討論。見《常州詞派研究》，頁165。

²⁵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3。

²⁶ 同前註，頁1635。

²⁷ 同前註，頁1636。

²⁸ 同前註，頁1650。

²⁹ 同前註，頁1654。

³⁰ 同前註，頁1657。

（三）《詞辨》、《宋四家詞選》對個體情性的肯定

據前文所述，周濟在《詞辨》時期強調「詞史」觀，自此以往，作品反映時代盛衰的關懷便成為其詞論的核心，但周濟同時也看重作家的個體情性。³¹表面上看來，周濟評論詞家的方式似乎和其他清代詞論家散論各家風格的評點方式並無二致，然而考察周濟對個體情性的思路，前期顯然已經具有「家數」的區分概念，等到《宋四家詞選》時，又更具體地透過選本區分「家數」的特質、判別高下而建構「門徑」觀的進程次序，換言之，「詞史」觀自始至終都是周濟詞論的基調，屬於對社會群體的關懷，與此同時，周濟也肯定個別作家的殊異性，並形成「四家學詞門徑」的家數系統。

下文將繼續討論兩個問題，一是周濟對作者個體情性的抉發，以及個別作者背後所共同具有的情感歸向，這在《詞辨》時期便已經提出。其二，從《詞辨》到《宋四家詞選》，經過二十年（1812-1832）的鍛鍊，當周濟再度重新編輯詞選、提出「四家學詞門徑」時，便具體展現對作家個體情性的肯定。

周濟在《詞辨·自序》提出對作者個體情性的論述說：

古稱作者，豈不難哉。自溫庭筠、韋莊、歐陽修、秦觀、周邦彥、周密、吳文英、王沂孫、張炎之流，莫不蘊藉深厚，而才豔思力，各騁一途，以極其致。譬如匡廬、衡嶽，殊體而並勝，南威、西施，別態而同妍矣。³²

³¹ 侯雅文，〈常州詞派的變遷趨向及其終界〉認為：「文學領域中，由於此一（個體）意識的發用，文學行為的價值也從集體意識的框限裏解放出來，講究以自適為貴。基此，則在文化個體意識的發用下，產生文學行為的改變，以對抗在文化集體意識框限下所形塑的文學觀念與創作格套。」可見周濟論詞並不只框限在「詞史」、「寄託」的範圍，對個體情性的肯定，是促成文學創作多元發展、持續創新的關鍵。見《中國文學流派學初論——以常州詞派為例》，頁413-414。

³² 清·周濟〈詞辨自序〉，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7。

周濟肯認創作者個體情性、生命際遇的差異，認為各家「才艷思力，各騁一途」，「殊體並勝」、「別態同妍」皆有可觀。相較之下，浙西詞派設定一個「醇雅」的境界範疇作為詞派的指標，顯見周濟詞論更具有包容性。然而，創作者在各展才性之時，仍有必須掌握的根本道理，在「殊體並勝」的情況背後，所關注的是「蘊藉深厚」的課題，透過內在情感的蓄積沉澱，才能提升到普遍性。所以《詞辨·自序》接著從「殊體」、「別態」的表面差異，轉而由讀者鑑賞、選詞的去取標準，³³談詞體內在情性的問題，他說：

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是故入人為深，感人為遠，往往流連反復，有平矜釋躁、懲忿窒欲、敦薄寬鄙之功。³⁴

前文屢次述及周濟繼承以詩、騷之政教情性看待詞體，但另一方面，周濟發現詞體創作的多樣性，賦予「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更多細微層面的情感內涵，「未必咸本莊雅」正好指明感物的情性本來就不只呈現「莊」、「雅」這幾種表現風格，只是讀者在「諷誦」其詞、「紬繹」其義之時，即使能分判諸家之別，最終仍需合乎儒家「歸諸中正」的目的性，達到教化的功能。

由此可知，周濟從早期便兼具二者，既觀照家國意識，同時也顧及作者個體的特殊性。只是《詞辨》雖有「家數」區分的概念，但仍從正、變等架構依時代編選名家之作，還屬於張惠言詩騷言志的傳統範圍，但從《詞辨》的詞論、³⁵選詞數³⁶來看，已經隱然有「四家門徑」的面目，

³³ 吳宏一，〈常州派詞學研究〉由孟子「以意逆志」說的讀者鑑賞角度來闡述周濟此段文字。見《清代詞學四論》，頁141。

³⁴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7。

³⁵ 如《介存齋論詞雜著》「姜張非巨擘」說：「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藉由思索碧山、夢窗的詞學地位，作為姜、張詞的參照，後來碧山、夢窗成為「四家門徑」的代表。同前註，頁1629。

³⁶ 《詞辨》以溫庭筠10首、李後主9首為正變之首，故選詞數最多，其他則以辛棄疾10首、周邦彥9首、王沂孫6首、吳文英5首為多，可見《詞辨》

且有示人津筏的抱負。到了《宋四家詞選》，姑不論提出四大統系的理論依據及其合理性，「四家學詞門徑」已經完全以作家風格為核心架構，³⁷這個現象或許可以說明，經過二十年，周濟對個體情性的發揚，已經凌駕了家國關懷的集體論述，從中也能體會到周濟詞論關懷重心的偏移，常派對「情志內涵」的強調多少懷抱著經世的理想，轉向「家數」、「門徑」觀的論述，則是選擇肩負起詞派學術傳承的使命，而以「門徑」的學習步驟建立詞統並指導後學。

三、周濟「南北宋門徑」的建構理路

(一)「門徑」釋義：詞統譜系與學習歷程的「經典」轉移

周濟的「詞史」觀和「門徑」觀是其整體詞論的核心，所不同的是，「詞史」在《詞辨》時期便已發展完備，並成為「門徑」區分的判斷指標之一；至於「門徑」觀念的思索，才是促使周濟詞論持續發展的首要原因。那麼，周濟提出「門徑」指標的背後，究竟懷抱著什麼樣的理念呢？

首先，關於「門徑」一詞，³⁸《介存齋論詞雜著》論姜夔「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³⁹「門徑」之意側重於法度，直到〈宋四家詞選目

時期已有「四家門徑」的雛形。而蘇軾 2 首、姜夔 3 首雖有選錄卻並不多，足見「退蘇進辛、糾彈姜張」的理路在前期也有脈絡可循。關於《詞辨》選詞數量，參清·周濟著，尹志騰校點，《詞辨》，收於《清人選評詞集三種》（濟南：齊魯書社，1988）。

³⁷ 《宋四家詞選》的編選體例，關於四大家的選詞數，王沂孫 20 首、吳文英 22 首、辛棄疾 24 首、周邦彥 26 首，隨著學詞階陞的提升，選詞數便有意識地遞增，以別高低。至於四大家的附錄詞人皆兼含南北宋，可見《宋四家詞選》是依作家風格類型編選，不同於《詞辨》以時代為經。此外，附錄詞人選詞數次多者，〈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皆曾於不同層面述及，可知周濟對詞人地位升降的判定，思慮周延。選詞數參《宋四家詞選箋注》。

³⁸ 張伯偉認為晚唐五代詩格受佛典影響，流行以「門」作為結構形式和論詩術語。「門」最基本的含義為「通」，初學者出入由之，落實到文學批評，

錄序論〉才細緻地運用「門徑」意象所隱喻的內涵，以入門之後到沿途所經歷的種種景象與體會，比擬學詞進程中諸多可能的情狀，並對應到實際指涉的對象，「門徑」在周濟詞論中因此成為專門術語。周濟說：

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初學琢得五七字成句，便思高揖晏、周，殆不然也。⁴⁰

「門徑」在此具有多義性，包含學詞的方法、對象、以及學習步驟。由於學習對象如南北宋詞家有淺深難易之別，初學者並非剛入門就能上契北宋「無門徑」的經典作家，必須透過循序漸進的「門徑」步驟，才能熟稔各家不同的詞學法度，並化為己用。⁴¹只是無論「門徑」所指為何，論者始終處在閱讀詮釋的後設立場，最終都是為了尋找新的「經典」，建立「詞統」以便於學習。

周濟「門徑」觀反映了由「浙」而「常」的「經典轉移」，藉由新經典的確立，重新標舉常州詞派的「詞統」譜系，另一方面，周濟終其一生都在揣摩如何更有效的「學詞」，因此「門徑」觀也比在此之前的朱彝尊、張惠言等人的詞論更具有經典傳承、學習的實踐意義。說明如下：

1. 「破浙立常，建立新經典」的詞統觀

清代詞派為了確立自家理論，往往提出修正前代甚至於反對的觀點，針對往代經典區分高下優劣，建立各自的「詞統」譜系。「詞統」是為了呼應詞派宗旨而提出的具有指標性的譜系，長遠來看，則是期望能延續詞派的中心信念，由源流正變來說，正統經典最完滿的狀態不斷在流失，因此要追尋回歸古典之道，必須透過言行來傳承，經由學習來

既可指寫作範式，也可以是藝術手法。見《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19-23。初學入「門」的必由之路為「徑」，「門徑」作為複合名詞於清代已是慣用語，指做事的途徑、方法或訣竅。

³⁹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4。

⁴⁰ 同前註，頁1645。

⁴¹ 周濟論詞以北宋詞為高，但是實際論述反而更重視南宋詞法的鍛鍊，當是因初學入門之便。

建立經典的價值，所以「詞統」具有將經典價值保存下來的功用。「詞統」背後即具有傳承的、經典的以及學習的意義；另一方面，由於文學容許各種聲音的展現，並不定執於同一標準的追求，因此，各家派依其美學觀點的不同主張，所建立的「詞統」譜系自然也有差異。⁴²

若參照各家詞派對其「經典」的認知，首先將會發現周濟「詞統」對浙、常兩派詞論皆有破除與創立之處。例如，比較浙派和周濟的「詞統」會發現，另立「四家門徑」，實際上是對浙西典範的修正，⁴³此外，比起浙派強調姜、張詞統的特定風格，周濟四家詞統看來更具有包容力，不但強調「殊體並勝」、「別態同妍」，同時也關注詞人內在生命的「蘊藉深厚」、「寄託出入」。又例如，周濟對常州詞派內部「詞統」的修正，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夢窗的評價。張惠言將夢窗置於次要詞人之列，⁴⁴既不同於浙派將夢窗列於姜、張詞的支系，也和周濟「四家門徑」極力標榜夢窗有別；同時，張惠言論詞最重晚唐五代，⁴⁵周濟「四家門

⁴² 例如《詞辨·自序》說「弟子田生端，學為詞，因欲次第古人之作，辨其是非，與二張、董氏各存案略，庶幾他日有所觀省。」「次第古人之作」的動機，既是為了教學，同時也可以表達自己的詞學觀點，以與他人區隔。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7。

⁴³ 周濟指出白石在浙西詞派雖「號為宗工，然亦有俗濫處、寒酸處、補湊處、敷衍處、支處、複處」等諸多疵病，對張炎「才本不高，專恃磨礪雕琢」的評價更低，是以另立「詞統」，也具有破浙立常的意味。見〈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同前註，頁1644。

⁴⁴ 清·張惠言，《詞選·序》：「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同前註，頁1617。夢窗詞「枝而不物」，「枝」指因物象排比緊密而枝蔓紛繁，「不物」指雜端難喻，旨意難以掌握，雖然肯定夢窗字句錘鍊的用心，但總體的評價並不高，即如夏承燾〈吳夢窗詞箋釋·序〉所言「隱辭幽思，陳喻多歧」，見楊鐵夫，《夢窗詞全集箋釋》（臺北：學海出版社，1974），頁1。

⁴⁵ 清·張惠言，《詞選·序》：「自唐之詞人李白為首，其後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並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為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

徑」則以南北宋詞為主。無論是對作家評價的差異或是對經典文本的認知差別，可以確定的是，周濟《詞辨》在接受張惠言理論後，至《宋四家詞選》時已卓然成家，對於新經典有其個人的認知與體會，並且另立常派「詞統」譜系。⁴⁶

其次，周濟「四家統系」另一特殊之處在於排序方式。無論浙派或者張惠言，「詞統」典範的排序都是由高階到低階，先立乎其大者；⁴⁷有趣的是，周濟在後期「四家門徑」的安排則是循序由低階提升到高階，⁴⁸那麼，該如何看待這種排序現象呢？也許，周濟「四家統系」不再僅止於標舉理念宗旨，而是更重視具體實踐的學習步驟，是以「四家門徑」的次序由低階到高階，著重各學習進程的階段性目標，如此說來，周濟「四家統系」在破浙立常、修正常派內部「詞統」譜系之餘，同時也改動了清初以來「詞統」的運作模式，從原本強調理念的「詞統」觀，轉而由學習的角度去思考。

2. 經典認同的過程所形成的「學詞門徑」

周濟自道「學詞三變」，其自身的學詞歷程也是幾經周折，⁴⁹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他始終重視「門徑」的議題，反覆琢磨學習的歷程，意

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17。

⁴⁶ 侯雅文關注到經典轉移所帶來的現象，從周濟「學詞門徑」的詞統家數和常派以及其他詞派相異或重疊之處進行反思，進而梳理出文學流派判分的基準，其云：「倘若透過觀察詞家所樹立之典範詞人去區判是否可為『常派』成員時，僅就『典範詞人的人名』為準據，去進行表層的比對，那麼張惠言不重視吳文英，但周濟卻十分推崇之，如此一來，為何周濟還能算是『常派』？又我們該如何面對『周邦彥』既是浙派厲鶚最推崇的詞人，也是『常派』周濟最推崇的詞人；『辛棄疾』既是陽羨派最推崇的詞人，也是周濟所樹立的典範詞人？」見《中國文學流派學初論——以常州詞派為例》，頁26。

⁴⁷ 如朱彝尊，〈靜惕堂詞序〉說：「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見《曝書亭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頁950。

⁴⁸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43。

⁴⁹ 如《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為外道，由今思之，可謂瞽人捫鑰也。」可見周濟不斷在反思、修正其詞學觀點。同前

在金針度人，以期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經由前述，隱約可以感到周濟的「詞統」與「學詞門徑」似乎有界線重疊之處，二者皆具備「學」的基本立意，然而觀照的層面實則有別。

「詞統」提出的經典是詞派中「學」的最高典範，經由抉發作者個體情性的內涵，次第古人之作、區分經典作家的等級，並擇取入門階陞的代表，透過對新經典的認同，建立四大家數的新「詞統」；至於「學詞門徑」則如蔣兆蘭之論周濟「為學人導先路，詞學始有統系」，更著重在認同新經典、區分門徑次序的過程，並由此進行各個層面的思考，例如學習對象的認同、學詞進程和不同時期的階段性目標等，環繞著「學」的動機，使初學詞者有所依憑，⁵⁰因此周濟對「學詞門徑」的目標設定，在於「門徑」能如實具體、有步驟地傳承詞派宗旨，實踐意義大於理念意義。⁵¹

（二）「南北宋門徑」的層次建構與界定

上文先論述「門徑」的理論意義，接下來將轉向學詞「進程」的討論，分析周濟賦予「門徑」的具體內容。由於「門徑」觀貫串周濟的學詞生涯，因此可由「門徑」尋繹其詞學觀念發展的軌跡，大體而言，周濟先有對「南北宋詞門徑」的認識差異，次有「由北開南，由南追北」的南北宋交涉，接著便打通南北而有「四家門徑」的學詞歷程，一系列的演變具有層次遞進的關係。

註，頁 1634。

⁵⁰ 學習需要循序漸進地累積，如〈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所說：「初學琢得五七字成句，便思高揖晏、周，殆不然也。」同前註，頁 1645。

⁵¹ 龍榆生，〈選詞標準論〉說：「（周濟）所標宗旨，殆不僅以『尊體』、『開宗』，而特富『傳燈』之意；在近代選本中，可謂最能示人以津筏，最有步驟及計畫者矣。」可知「四家門徑」同時具有「詞統」以及「學」的意義，較其他選本更具學習的立意和步驟。見《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90

1. 南北宋門徑的區別

南北宋詞的特質具有可學與不可學的差別，周濟對南北宋詞的認知，是影響「門徑」觀建構的主要因素，由於「門徑」取決於技巧層次的高度，北宋詞本來就沒有法門的前提，自然就不會由「門徑」入手，也因此，「學詞門徑」必須要以南宋作為徑路。周濟早在《介存齋論詞雜著》時期便反覆涵詠他閱讀南北宋詞的感想與體驗，其云：

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⁵²

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⁵³

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⁵⁴

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⁵⁵

後期於〈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亦云：

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而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⁵⁶

大抵而言，北宋詞如歐陽修的「當行」、秦觀的「和婉醇正」等，⁵⁷皆「無門徑」可學，因此「似易實難」。北宋詞在「主樂章」的「應歌」背景下，「情景但取當前」且「就景敘情」，即時性的創作容易有「拙率之病」而鮮有深刻的情志寄託；然而上乘之作，則以內在醞釀的性情面對創作，思筆渾然一體，具有直接感發的力量。換言之，北宋早期的

⁵² 「兩宋詞各有盛衰」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29。

⁵³ 「應歌應社詞」條，同前註，頁1629。

⁵⁴ 「學詞途徑」條，同前註，頁1630。

⁵⁵ 「姜夔詞」條，同前註，頁1634。

⁵⁶ 同前註，頁1645。

⁵⁷ 同前註，頁1644、1643。

好詞，已經是醞釀完成的結果，因性情與創作相合，應物命筆之際自然達到「四照玲瓏」、「實」的「渾涵」境界，可以說是跳過法度門徑，或者說忽略了「寄託入」的過程，便自然達到「無寄託出」的效果。

反之，南宋詞「有門徑」，「鍼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⁵⁸由於南宋「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文士苦心經營「筆法」，鍛鍊出多種「門徑」類型，風格「變化益多，取材益富」，學詞者因此能從法門入手，但並不是指每個人都能達到某種高度，因此「門徑」的類型還可再加以細分。另一方面，相較於北宋詞多「就景敘情」，反映當下氛圍生發的情感流動，以情為主；南宋文人的創作背景多為「應社」之詞，⁵⁹於是形就「即事敘景」的創作模式，「即事敘景」猶如應事「命題」，「事」與「景」之間強調關目的呼應扣合，所敘之「景」由於文人弄「筆」，講究詞作細部的「片段、離合、色澤、音節」，⁶⁰「對學詞的經驗與技法刻意為之，不能了無痕跡」，⁶¹人工斧痕使得南宋各家「有門徑」可供辨識，也因此「似深而實淺」。

南北宋詞的區分在前期已大體成形，到〈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則以「四家門徑」來判分學詞進程，與此同時，周濟還打破南北，反思南北宋詞交涉的細微影響，南北宋詞因而不再僅止於兩個時代的區分。

2. 南北宋詞的交涉：由北開南，由南追北

就周濟的詞學觀而言，南北宋詞的分野是依時代所區分出的兩種相異的類型，所以南北宋詞的差異，一直是周濟長期關注的焦點。到了後

⁵⁸ 《介存齋論詞雜著》「溫庭筠詞」條，同前註，頁 1631。

⁵⁹ 王偉勇指出：「今所傳《樂府補題》一卷，即當時詞社雅集之作，頗能見出詞人輪流作主，擬賦唱和之況也。」見《南宋詞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 65。另外，劉少雄〈周濟與南宋典雅詞派〉云：「應歌與應社的服務性質不同，作家為文造情，以無謂之詞應付歌筵酒席或詞社組織之要求，所作不失於佻即失於漏。北宋易犯拙率之病、南宋難臻渾涵之詣，都與這從俗、鬥巧的創作心理有關。」見《詞學文體與史觀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10），頁 233。

⁶⁰ 《介存齋論詞雜著》「學詞以用心為主」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1630。

⁶¹ 黃志浩，《常州詞派研究》，頁 179-180。

期，周濟的觀念轉趨細膩，如果北宋詞是一種典型，那麼作為後起者的南宋詞壇，也應該具有文學的影響與模擬的效應，或許能透過後起的特定作家，觀察到南北宋詞交流融攝的過程，因此〈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提出南北宋詞的交涉的現象，他說：

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是詞家轉境。⁶²

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⁶³

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為北宋之穠摯。⁶⁴

這裡周濟透過「四家門徑」之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來談論南北宋詞交涉的細微轉換，並以此來思考稼軒、夢窗的四家位階。稼軒由北宋類型開啟南宋詞風，是南宋諸公的典範人物，屬於前行者順行的歷程，也就是說，在夢窗、碧山當時也曾受稼軒影響。至於身為後起者的夢窗，是先有了多種「門徑」的學養認知，才開始重新涵養寫作前置準備的情思蘊藉，例如夢窗身處的文化場域早已重視清真詞法的鍛鍊，上追北宋之穠摯是當時的詞學思潮，⁶⁵因此，他具備的是「追北」的逆溯歷程。

換言之，關於南北門徑交涉的順逆現象，稼軒作為「有轍可循」的前行者，是周濟詮說的設定，屬於周濟美感價值的判斷，不全然由歷史先後順序來決定；至於夢窗既在清真、稼軒之後，必然繼承了「有門徑」的寫作影響，這是歷史既成的事實。另外，稼軒「由北開南」，雖是南宋詞家，但因其身世之感而顯得「沈著痛快」，以內蘊之氣鍛鍊多種詞

⁶²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44。

⁶³ 同前註，頁1644。

⁶⁴ 同前註，頁1643。

⁶⁵ 如宋·尹煥藉由標舉清真以此讚揚夢窗詞，其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宋·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十，收於唐圭璋編，《唐宋人選唐宋詞》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835。另外，夢窗與尹煥餞別，席間連歌數闋清真詞，見夢窗詞〈惜黃花慢〉小序：「邦人趙簿攜小妓侑尊，連歌數闋，皆清真詞。酒盡已四鼓，賦此餞尹梅津。」見楊鐵夫，《夢窗詞全集箋釋》，頁226-227。兩則資料闡明清真詞在夢窗當時身處的文化場域備受推崇。

作風格，因此廣開南宋門徑。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在有「寄託入」的程度上，奇與壯的筆、意超越了南宋諸家，並有意模擬北宋詞風，然而在以「無寄託出」的深刻感人處，南宋諸家普遍不如北宋，夢窗亦如是。

綜上所述，「四家門徑」之「歷夢窗、稼軒」，兩種「歷」具有一種互補的關係，既往北宋詞法追摹，又掌握南宋文人開啟的種種法門，因此，周濟對於夢窗、稼軒的體認，即有兼蓄南北宋詞法的用意。

四、「問塗」、經「歷」與回「還」： 談「四家門徑」的脈絡

周濟對「南北宋門徑」的思考，已經逐步建構「四家門徑」由南返北的脈絡，至於四家之所以立，是因為「有轍可循」，即是有法度的代表。那麼周濟是以什麼判斷標準來區分「四家門徑」的高低呢？

（一）四家詞位階的判斷標準：思筆離合、寄託出入

1. 思筆離合

「離合」的歷史語境出自劉勰（464-359）《文心雕龍·章句》篇：
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皆以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⁶⁶

「離章合句」為安章宅句的過程，基本義指分段和造句，若由創作的整體過程來觀察，「離章合句」乃以「意」為主，章法「隨變適會」並無一定的準則，因此亦指創作時章句結構的經營變化。換言之，「離合」由分析、合組的語義分化出另一抽象概念，亦即在意的基礎上，進行章句筆法的「變化」。此處將周濟文中之「思筆」、「離合」合鑄為「思

⁶⁶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1），頁647。

筆離合」一詞，顧名思義，即是指思與筆的離合變化。「思筆」源於〈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說：「詞以思、筆為入門階陞。」⁶⁷周濟從創作體驗抽繹出「思、筆」的二元要素，思筆的變化形式、變化條件，⁶⁸乃至總體營造的效果皆是用以評判作家的標準。由於南宋文人競相在「筆」上下功夫，形成各種法度，「思筆離合」的運用效果逐漸區分出「門徑」高低，如周濟便以此比較碧山統系選詞數次多的張炎和史達祖，⁶⁹又如「碧山思筆可謂雙絕，幽折處大勝白石」、⁷⁰「玉田惟換筆不換意」⁷¹等評價即是由此而來。

關於思、筆的內涵，《介存齋論詞雜著》提到：

學詞先以用心為主，遇一事，見一物，即能沉思獨往，冥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則講片段，次則講離合，成片段而無離合，一覽索然矣。次則講色澤音節。⁷²

這則詞話雖未明確點出「思」與「筆」，但已蘊含相近的意思。初學者應培養觀察、深思的能力，「用心」去體會事物，「沉思獨往，冥然終日」即是「思」的醞釀期，思力一方面屬於內在的素養，另一方面，意念的生發也是「筆」的根據和前提條件。而「筆」則屬於創作形式的探討，字面意象之色澤音節、篇章結構之片段離合，都是筆最基本的層次。周濟又說：

⁶⁷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44。

⁶⁸ 例如「思筆可離」的變化形式，並非如表面字義所見之筆不切合思，而是指筆不沾滯於詞章意旨，才能有出人意表的形容，如評清真「層層脫換，筆筆往復處」、「若有意若無意，使人目眩」即是。同前註，頁1646、1647。此外，筆、意的變化條件也有主從關係，所謂「筆以行意也，不行須換筆」，筆的各種變化是為了能如實地表述思力所凝鍊出來的意念，但也不能過度拘泥意旨，「換筆不行，便須換意。」同前註，頁1644。

⁶⁹ 如「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玉田才本不高，專恃磨礱雕琢。」同前註，頁1644。

⁷⁰ 同前註。

⁷¹ 同前註。

⁷² 同前註，頁1630。

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⁷³

初學詞者需鍛鍊筆力，嘗試掌握詞體的美感特質，意象、章法所營構出來的整體效果，最好能讓情感足以在其中自然往來流動，盡量達到表裏相宣，屬於求「空」的階段。待到自成格調之時，已能隨意驅遣筆鋒，更要鍛鍊內心思意，使筆鋒飽含從創作者個人內在的才性見識透發出來的力道，呈現創作內化的習慣性，所以「精力彌滿」之作，看似閒筆寫來無所寄託，卻往往能「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屬於求「實」的階段。「空」、「實」既是初學與既成格調者的區分，也分別指向南北宋詞的差異，「思筆離合」的運用因此成為決定「門徑」高低的關鍵，不管是作為入門階陞、或既成格調的階段，都需要反覆琢磨。由於「思、筆」的二元要素僅是閱讀與創作時判斷作品好壞的簡要標準，周濟於是進一步提出「寄託出入」說的審美標準。

2. 寄託出入說

周濟一貫強調「詞史」、「寄託」之意，〈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把強調具有實質內涵的「寄託」說放入創作的整體過程來思考，形成「寄託出入說」。⁷⁴「寄託出入說」是周濟貫通「四家門徑」重要的文學論述，從碧山到清真的「四家門徑」，正反映了一個逐漸放下法門、由南

⁷³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0。

⁷⁴ 黃志浩指出「寄託說」與「寄託出入說」的差異，他說：「寄託的『有』、『無』屬於二元性問題，『出入說』則是一元論，即要在一篇作品中體現出『有寄託入』與『無寄託出』相統一的關係來。」見《常州詞派研究》，頁173。

返北、走向渾化的歷程，因此，「寄託出入說」的過程實際上是反映四家階陞的理論基礎。周濟說：

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冒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謦咳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繪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⁷⁵

「寄託入」不僅專注於內在情志的真切，同時更多地投注在個體情感與萬物自然的流轉互動中，「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對事物深切體察才能使情感適當的發用，並透過意象物類的聯繫開啟想像，因此，「寄託入」不只是一個進入的門徑，而且是個體蘊藉的工夫。此外，除了對外物的觀察，作者自身的情感也是隨物生發、千變萬化。

「驅心」一句指創作者的構思活動如何捕捉細微的思緒，「遊絲」、「飛英」兩者皆是輕小飄動之物，單是觀察一物之微，已須十分專注，何況是兩者細微的互動牽扯，更是難以捉摸，心靈必須專注投入一段時間，方能成就。周濟以具體的形象比喻自我心靈與事、物的融會，逐漸凝定出最適切的藝術形象，以彰顯寫詞的心靈狀態。由於複雜幽微的意旨需要具備高妙的技巧才能充分表達，因此「含毫」一句接著強調落筆的技巧要能精準，如莊子「庖丁解牛」之「以無厚入有間」，達到技巧純熟且游刃有餘的境地。⁷⁶

⁷⁵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43。

⁷⁶ 繆鉞於，〈常州派詞論家「以無厚入有間」說詮釋〉指出董士錫與周濟皆認為由於五代北宋初的詞大都無寄託，南宋詞始多有意寄託之作，是以表現出「以無厚入有間」的技巧，才能貫串錯綜複雜的情事，而於詞中託意深遠。見繆鉞、葉嘉瑩，《詞學古今談》（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2），頁190-194。此外，吳宏一，〈常州派詞學研究〉認為「無厚入有間」之蘊藉深微的寫作技巧，是有寄託入變成無寄託出的關鍵。見《清代詞學四論》，頁149。

「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警效弗違，斯入矣。」意感、假類、閱載、警效等四者，是創作主體對各種生命資源的召喚，或是突如其來的情緒、信手拈來的引譬連類、或由閱讀經驗充分汲取、或者是感官經驗如實體現等種種時刻，合併成為創作主體的養分，這種「入」是一種極其深厚的「蘊藉」。至於「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則是形容「寄託入」之後的狀態，由於創作者長期陶養深厚的感受，因此即使是生活中細小的事物，都可以提煉出深微而有滋味的體會，隨境呈現意象鮮明的聯想，情與境自然地切合相融；經歷一段「醞釀」的沉潛時期，直到內在的興發感動轉向書寫創作時，自然能透過「冥發」不完全自覺的特殊經驗狀態，達到「妄中」無目的而合乎目的性的結果，而完成「無寄託出」的寫作實踐。⁷⁷

然而作品是否能達到「萬感橫集，五中無主」、「無寄託出」的效果，還需要從閱讀者的鑑賞角度來檢視作品整體是否渾融。「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周濟以各種意象形容閱讀詞作後所能引發的情感波動，可見詞體的言情特質具有容易為人投射的質素，尤其北宋「渾化」的詞風，書寫普遍的人情經驗，因此容易引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讀者反應論點。⁷⁸然而要達到「無寄託出」，需要錘鍊法度並且醞釀情思，因此「寄託出入說」由入到出的過程，正是代表「四家門徑」思筆渾化程度的差異。

經由上述可知，「思筆離合」的組合模式只是簡單的判準，創作運思實際上是遠為複雜的活動，因此批評工作經常要觀照到創作者所生存的客觀環境、主觀的創作理念以及個人性格等多重因素，⁷⁹周濟試圖以

⁷⁷ 參考葉嘉瑩，〈常州詞派與寄託之說的新檢討〉，《清詞叢論》，頁 165；遲寶東，《常州詞派與晚清詞風》，頁 67。

⁷⁸ 黃志浩：「作品與解讀者之間是一種若即若離的既聯繫又獨立的關係，解讀者往往要基於作品又超越作品。」見《常州詞派研究》，頁 174。

⁷⁹ 關於文學批評的尺度標準，劉漢初認為：「近人批評他（張炎）故國之思不夠強烈，是完全離開了張炎的時代，既不能體恤其客觀環境的壓力，又

「寄託出入說」來呈現心、物、思、筆多種層次的牽繫，所論列的尺度標準自然有所見與不見，因此周濟由「思筆離合」、「寄託出入」完成度的深淺來判斷「四家門徑」的代表詞家及其階陞高低時，偶爾也融合作者性情、生存處境來進行評論，顯見文學批評難以採用單一視角作為規範，但評價同時也決定了批評家的立場，「四家門徑」乃至北宋「渾化」的詞風，便代表著周濟論詞的尺度標準。

(二)「四家學詞門徑」的進程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藉「問塗」、「歷」、「還」等具有方向性的動作來安排「家數」之間的遞進關係，形成「門徑」觀，他說：

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

碧山具有能讓初學詞者遵循法度的可辨識性，因此成為門徑中「問塗」的典範；而以「歷」來陳述夢窗、稼軒，突出二人在學詞路徑的轉圜地位具有中介性指標的意義；至於清真之「還」則有歸宿之意，出入終始、消弭無痕，回返於「渾化」的境地。以下便分論周濟認為四家「領袖一代」的理由，以及四家階陞的次第脈絡：

1. 思筆雙絕、圭角分明：碧山詞為初學之階石

碧山是可見門徑的有法代表，由於創作情性的蘊藉程度不同，因而在「寄託出入」的歷程中產生差異，雖然「思筆雙絕」卻「不免圭角」，周濟認為：

詞以思、筆為入門階陞，碧山思、筆，可謂雙絕。幽折處，大勝白石。惟圭角太分明，反復讀之，有水清無魚之恨。⁸⁰

碧山饜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⁸¹

忽視他主觀的創作理念，而張炎本人性格上的因素，更完全拋開不管，這樣的批評不可謂之完善。」見〈清空與騷雅——張炎詞初論〉，《臺北師院語文集刊》第三期（1998.8），頁121。

⁸⁰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44。

⁸¹ 同前註，頁1643。

詠物最爭託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⁸²若由「思筆離合」來論，王沂孫用「筆」實踐的完成度，已經精熟「片段、離合、色澤、音節」等要求；至於其「思」可謂「鑿心切理」，「鑿心」是對周遭事物有深刻的感悟與洞察，當有寄託能入時，感物至深便易得其神理。若思、筆搭配得宜，自然能達到「言近指遠」的美感經驗，因此，初學詞者從「詠物詞」來鍛鍊思、筆，由於物理、情意都有一定的特質可以依憑，情物雙寫時只要「以意貫串」，便能透過詠物之模形寫神以抒發家國身世之感，因為創作法度鮮明，所以適合入門者學習。由於碧山最出色的詠物詞在「託意、隸事」方面已臻「渾化無痕」的高度，是以稱許他「思筆雙絕」。然而碧山之「筆」雖能使「聲容調度，一一可循」，細辨之，有時卻顯得鑿痕處「圭角太分明」，「反復讀之，有水清無魚之恨」，即指南宋門徑「似深實淺」，未能達到北宋詞「渾化」的境地。

碧山雖是入門階陞，但也是「既成格調」的大家，因此這其中具有一種成長的過渡，相當於格調的完成。初學需透過「寄託能入」的工夫以發揚個人情性，「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一位作家要立足於文學史的評價，不僅要具備人類普遍的情感狀態，還應於情感經驗的豐富與深刻上，達到某種普遍而透徹的程度，才有其特出的地位。是以王沂孫能成為「問塗」的階陞，也有其「無寄託能出」的高度。周濟論：

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⁸³

碧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⁸⁴

可見透過性情的發揚，王沂孫確實有恬淡、淺近的獨到處，雖「多故國之感」有所寄託，而「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著力不多」，

⁸²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44。

⁸³ 《介存齋論詞雜著》「王沂孫詞」條，同前註，頁1635。

⁸⁴ 同前註，頁1644。

暗指碧山詞有寄託而能出。此外，周濟「詞史」強調詞作內容要言之有物、反映家國身世之感，是判斷「四家門徑」的共同宗旨之一，因此設定入門階陞首要注意之事，便是作品要能反映家國之思，以有寄託入。

2. 立意高：夢窗詞作為南宋縮合北宋的階段

夢窗是先有對南北宋門徑的認識，在此文化陶冶下去涵養寫作前置的蘊藉，因此他具備的是「追北」的逆溯歷程，關於夢窗作品的成就，周濟評價云：

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為北宋之穠摯。⁸⁵

夢窗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惟過嗜鉅釘，以此被議。若其虛實並到之作，雖清真不過也。⁸⁶

夢窗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夢窗非無生澀處，總勝空滑。況其佳者，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閑散，使人不易測其中之所有。⁸⁷

夢窗「取徑」跨越南宋白石「清泚」的格局，上接北宋「濃摯」的詞風作為取法的模範。其密澀的筆法較諸碧山更為雕琢，甚至「過嗜鉅釘」，以豐富的典故、詞彙來雕琢詞章，是錘鍊法度的代表；用筆雖「穠」但「非無生澀處」，不免有損情感的深刻性，只是周濟認為「質實」「總勝空滑」，更何況夢窗運筆用意自有佳篇。

相較於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立意不高，取韻不遠」⁸⁸的負面例子，夢窗「立意高」是駕馭筆的重要指標，「高」具有居高臨下的視野，當運筆用意超越尋常的眼光，便能進入深刻的理境。在這個學詞階段，強調構思的深厚「蘊藉」，密澀的筆法背後以「意」為前提的因素被突出，使得門徑中的錘鍊不僅是困守字句的書寫，而是在意念先行的情況下，換筆、換意成為「以無厚入有間」的自由應用，活用「思

⁸⁵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43。

⁸⁶ 同前註，頁1644。

⁸⁷ 《介存齋論詞雜著》「良卿論吳文英詞」條，同前註，頁1633。

⁸⁸ 同前註，頁1644-1645。

筆離合」的創作法度，「每於空際轉身」甚至令人「追尋已遠」，是夢窗能成為「學詞門徑」的重要根據。然而，如龍榆生所言：

夢窗運思過密，而立意特高，亦為深造者必由之徑；而又慮其能實而不能空也，乃取『才情富艷，思力果銳』之稼軒以疎宕之。⁸⁹

夢窗企圖擺脫南宋詞風的習氣，向北宋追索，由清泚轉向穠摯，雖取得一定的成就，然而南宋門徑畢竟有「似深實淺」的毛病，夢窗詞法過於「穠」、「實」，使「摯」的深刻性減弱，因此感染力不如稼軒，也還不能渾化，所以夢窗是有法進入無法的第一階段。

3. 才情富艷：稼軒情操所開啟的南宋諸家門徑

前述稼軒詞「沉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又「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是詞家轉境」，這些看法大體表明周濟對詞史的觀察和對詞作高下層次的區分，「由北開南」意指南宋詞有門徑、有轍可循是由稼軒開始。周濟評曰：

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⁹⁰

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頭太露。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後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並無其情。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⁹¹

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⁹²

從北宋的淺近「無門徑」發展出南宋「文人弄筆」而「有門徑」的創作進路，南宋詞的區分是在「別態同妍」的認知下去掌握發展的脈絡，稼軒「由北開南」意味著一種動態的走向，以及多種風格類型的建立。稼軒能列於「學詞門徑」，正如碧山「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

⁸⁹ 龍榆生，〈選詞標準論〉，《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 90。

⁹⁰ 《介存齋論詞雜著》「姜夔詞」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1634。

⁹¹ 《介存齋論詞雜著》「蘇辛不同」條，同前註，頁 1633。

⁹² 同前註，頁 1643。

夢窗「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閒散」，周濟追求的是「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的「渾化」境界。

稼軒北人南來的生平經歷在詞體中注入深刻的主體情感與生命意識，⁹³使得詞作具有沉著而豐沛的情志，有其痛快悲涼的格調，「不平之鳴，隨處輒發」，英雄氣概形諸筆墨，不免有「鋒頭太露」之處，若非「才情富艷」，實難以駕馭「鬱勃」之氣，容易流於「粗豪」而離「渾化」的標準更遠。因此周濟由「才」、「情」、「思」來談稼軒用「筆」的深刻處，稼軒因「才大縱橫」，善於運用思、筆，將情感反覆內斂收挽、層層蘊蓄，以婉曲之筆收斂雄心高調，外揚的「雄心」、「高調」越是「斂」、「抗」，「欲飛還斂」⁹⁴的情感張力更顯「悲涼」。可以說，稼軒之筆疏宕，「有英雄語，無學問語，往往鋒頭太露」，而以才思逆挽；稼軒深刻的情感則彌補了露才揚己之處，「南北兩朝，實無其匹」。但也由於稼軒自身的英雄氣質太顯明，因此略與北宋「渾化」的詞風有所差異，所以相較於夢窗以筆法取勝，稼軒是從情志寄託轉向南宋門徑的代表人物，為南宋開啟種種法門，也是「四家門徑」有法進入無法的第二階段。

4. 蘊勾勒於渾厚：清真詞思筆渾融下的最終回歸

「四家門徑」與「寄託」、「蘊藉」、「思筆離合」相互融通的過程，反覆鍛鍊便有可能「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清真詞法即是由「門徑」進入之後，最終要「回還」的典範。所謂「清真，集大成者也」，⁹⁵是由思、筆離合的創作實踐來看能否達到詞法的最高成就，周濟說：

⁹³ 劉少雄說：「稼軒以北人入於南宋，詞風猶存北土氣格。」見《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頁 276。

⁹⁴ 鄭騫，〈杜著辛棄疾評傳序〉認為稼軒「生於南渡後不久的紹興十年，甫經淪陷的山東，北方的情形既能啟發激厲，使他想有所作為，而南方的氣氛又足以壓抑摧折，使他『欲飛還斂』。」見《從詩到曲》（臺北：順先出版公司，1976），頁 132。「欲飛還斂」引自稼軒〈水龍吟〉「過南劍雙溪樓」（舉頭西北浮雲），見宋·辛棄疾著，鄭騫校注，《稼軒詞校注》（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140。

⁹⁵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1643。

美成思力，獨絕千古，如顏平原書，雖未臻兩晉，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備。

後有作家，莫能出其範圍矣。讀得清真詞多，覺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經意。

鈎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鈎勒便薄，清真越鈎勒越渾厚。⁹⁶清真渾厚，正於鈎勒處見。他人一鈎勒便刻削，清真愈鈎勒愈渾厚。⁹⁷

清真沉痛至極，仍能含蓄。⁹⁸

周濟在此由創作法度的厚薄以及閱讀經驗的比較兩個層面來談論清真詞，⁹⁹首先，由創作法度來談，周濟一方面稱揚「美成思力，獨絕千古」，一方面說明清真詞筆暗合法度。清真以後諸人的筆法思力，皆不出清真詞法的藩籬，清真詞以「鈎勒」來統攝各種寫作技法，以筆見思終能「越鈎勒越渾厚」，筆法層層加深，終能達到「沉痛至極，仍能含蓄」的效果，「沉痛」指情感之深厚，「含蓄」乃是情思表述的委婉內斂，清真詞法即是技巧與情思渾化無迹的展現。

其次，周濟特別將自身設定為讀者，詮發閱讀之後的感受，所謂「讀得清真詞多，覺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經意」，寄託渾厚的作品經得起反覆閱讀、一再體會，相形之下，與碧山詞「反覆讀之，有水清無魚之恨」，兩者差別極大，可見「四家門徑」從「有寄託入」到「無寄託出」，作品的「渾厚」與否，是形成階陞高低的重要因素。至於「他人一鈎勒便刻削」、「便薄」，是因為僅止於筆法形迹，「清真愈鈎勒愈渾厚」則及於思。由於「經意」與否是由讀者的閱讀感受而來，並不意味著清真

⁹⁶ 《介存齋論詞雜著》「周邦彥詞」條，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32。

⁹⁷ 同前註，頁1643。

⁹⁸ 同前註。

⁹⁹ 侯雅文指出：「所謂「渾厚」指的是美成詞作的藝術性相，此一藝術性相乃由「鈎勒」而見，「鈎勒」是語言形式的操作，與政教效用無涉。是故《宋四家詞選》對美成作品的詮釋，幾乎集中在藝術技巧的分析。」見《中國文學流派學初論——以常州詞派為例》，頁415。

的自覺，因此清真這種不自覺的書寫卻能合乎「十分經意」而有法度，顯見「美成思力，獨絕千古」，因此「四家門徑」終歸要「還清真之渾化」，才算達到「寄託出入」的實踐。最後須辨明，清真是由南宋「門徑」進入而回歸的詞法典範，依然在「門徑」的範疇之中，並不是指詞體創作的最高成就，¹⁰⁰正如顏真卿之書法雖不及兩晉卻已是法度大備。因此，「四家門徑」除了「詞統」典範的意義外，更著重在「學」的各種步驟及內涵。

五、結語

周濟在《宋四家詞選》以「四家學詞門徑」重新梳理並建構其詞學論述，前期於《詞辨》所提出的「詞史」觀始終是周濟論詞的指標，並成為判別「家數」風格、影響「門徑」排序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先論周濟對常派張惠言詞論的承衍，常州詞派提倡「意內言外」的詮釋方法，重新規定作品的「情志內涵」借以「尊體」，並建立情志與表述模式的連結，透過言意關係形成隱喻的效果。周濟提出「詞史」觀，從張惠言「風騷意旨」的詩學詮釋脈絡回歸到詞學自身的特質，強調詞人由心態乃至內容立意都應展現對時代的關懷。同時周濟也認為「別態同妍」，肯定作家個體情性的差異，可見前期已有「家數」的區分。經過二十年，周濟對「情志內涵」的強調，已經轉向「家數」、「門徑」的論述，《宋四家詞選》完全以作者風格為核心架構，並發明具有層次遞進的「門徑」觀。

「門徑」觀是促使周濟詞論持續發展的首要原因，指涉「學」的各個層面。一方面反映由「浙」而「常」的經典轉移，藉由新經典的確立，重新標舉常派的「詞統」譜系，而周濟無論是對作家評價、對經典文本

¹⁰⁰ 吳宏一提到四家門徑的真正涵義在於「示人學詞所從入之途，而不是要人以此為止境。」見《清代詞學四論》，頁150。

的認知，多有與浙派、張惠言等人不同之處，已經自成體系；此外，周濟「四家學詞門徑」將經典次序從低階排到高階，修正了清初以來「詞統」的運作模式，不僅強調理念宗旨，更重視具體實踐的學習步驟、對象和方法。周濟「門徑」觀強調循序漸進，先區分「南北宋門徑」，由於北宋詞「思筆渾然」沒有法門的前提，南宋多「應社」之詞，文人弄筆、即事命題，難免留下斧痕，因此「學詞門徑」要以南宋詞作為徑路。之後周濟不只將南北宋詞風作為兩個時代的區分，還透過文學的影響模擬現象，從後起作家去觀察南北宋詞融攝的可能效應，而認為稼軒、夢窗具有「由北開南，由南追北」的互補關係。

周濟對「南北宋門徑」的思考，逐步建構出由南返北的脈絡，於是以「思筆離合」、「寄託出入」完成度的深淺，作為判斷「四家門徑」的進程，大抵上，四家皆是有法度的代表，同時各別具有其性情、生存處境所引起的家國之思。碧山思筆雙絕、尤擅詠物，卻「不免圭角」，因創作法度鮮明，所以適合初學作為入門階陞；夢窗因追摹北宋濃摯的詞法所以「立意高」，又因筆法密澀而成為法度錘鍊的代表，卻也不免有損情感的深刻性，是有法進入無法的第一階段；稼軒「才情富艷」，鬱勃的情志具有感染力，又能以才學思力、以婉曲之筆收斂雄心高調，因風格多樣，所以開啟南宋門徑，只是英雄氣質鮮明，仍與北宋詞風有別，是有法進入無法的第二階段；清真詞思筆渾融、有法而無法，運用層層「鈎勒」的筆法，含蓄地表達內在沉痛的情思，用心經營法度終能達到「以無寄託出」的「渾化」效果，因此成為「門徑」的最高典範。

綜上所述，以「門徑」觀為論述主軸，可以發現周濟由前期到後期之詞學關懷逐漸變化、轉向的歷程，「四家學詞門徑」可以說是周濟詞學理論的創獲，從此穩固了常州詞派在清代詞壇的影響力。

Initiation, Process, and Completion—the Theory Construction about Zhou Ji’s “Agenda of Studying the Ci Poetry from Four Writers”

Yun-Jun She*

Abstract

In Zhou Ji’s foreword to his *Selected Ci Poetry from Four Writers in Sung Dynasty*, he suggested an agenda of studying the ci poetry. His method began with Bi-Shan, passing through Meng-Chuang and Jiaxuan, and concluded with Qing-Zhen. Wha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genda of studying ci poetry? What’s Zhou’s theoretical premise? How did the four writers come to be exemplary figures? What’s the implication by the order of the four writers? These issues haven’t been satisfactorily addressed to date.

As a resul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Chang ci poetry schools; their creative consciousness, aesthetics, and the orthodox of ci poetry are explored. In fact, the agenda of studying the ci poetry is constructed from Zhou’s theories about the history of ci poetry and the style of individual author. Hence we arrive at an understanding of Zhou’s renovation of Chang ci poetry schools: by proposing an agenda of studying ci poetry, Zhou enriched the idea of the orthodox of ci poetry. He authorized canonical texts and stressed the practical advantages of learning and inheriting them. Final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genda of the North and South Song ci poetry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 of them, thus finds the degrees of “the agenda of studying the ci poetry from four writers.” Marked by degrees in content and technique, the agenda represented the process that began with hard effort and concluded with sprezzatura.

Keywords: Zhou Ji, the agenda of studying Ci poetry, the history of Ci poetry, orthodox Ci poetry, the allegory from going in till out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